

敦煌、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 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^①

杨 铭

内容提要：本文结合敦煌、新疆出土的古藏文文书与相关的汉文文献，深入地探讨了有关唐代吐蕃与苏毗关系中的若干史事，内容涉及吐蕃对苏毗的征服与军政建制、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、中晚唐敦煌和西域的苏毗人等，进一步揭示了隋唐时期苏毗在西北的分布、活动及其融合于吐蕃的轨迹。

关键词：吐蕃 苏毗 悉诺逻 孙波 孙波茹

中图分类号：K289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2—4743 (2011) 03—0026—07

苏毗是很早以来就活动于西域的一个古老的民族，新疆南部地区出土的隋唐之前的佉卢文书称苏毗为 *supiya*，敦煌、新疆南部地区出土的古藏文文献作 *sum po* 或 *sum pa*，由于古汉语没有读 *sum* 的字，故汉文文献译作“苏毗”或“孙波”。^②

吐蕃与苏毗的关系是从传说中的聂赤赞普之世开始的。《贤者喜宴》记载，聂赤赞普曾令蔡木田吉木嘉征服了苏毗派苯教师卧雍杰瓦 (*ho yong rgyal ba*)。在其后的吐蕃“天赤七王”时期，苏毗流行的宗教——苯教 (*bon po*) 逐渐形成为一个教派，称为“孙波苯波” (*sum po bon po*)。《贤者喜宴》还说，赞普仲年代如于苏毗域 (*sum pavi yul*) 与一苯教徒之妻名贾莫贾江 (*rgya mo rgya lcam*) 生有一子，名叫松日仁布 (*sum ri ring po*)，是吐蕃王朝第31代赞普达日年塞的异母长兄。^③ 到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，吐蕃与苏毗双方在宗教、文化诸领域内的关系进一步加强，吐蕃悉补野王朝经过达日年塞、囊日伦赞和松赞干布三代赞普的努力，

① 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2011年历史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建设项目(编号:2011XWD-S0601)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② 伯希和著;冯承钧译《苏毗》,收入《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》第1卷,商务印书馆,1962年,第20~21页;佐藤长《古代チベット史研究》上卷,同朋舍,1977年,第139~140页;林梅村《沙海古卷——中国所出佉卢文书》(初集),文物出版社,1988年,第637页。黄盛璋提出唐代西域地名“萨毗”亦来源于 *sum pa*,而笔者认为“萨毗”应是“鲜卑”的古音**saibi*,故不采。见黄盛璋《于闐文〈使河西记〉的历史地理研究》,《敦煌学辑刊》1986年第2期。杨铭《藏文史料中关于萨毗的记载》,《西北史地》1993年第4期。

③ 巴卧·祖拉陈瓦《贤者喜宴》,民族出版社,1986年,第159、170页;黄灏《〈贤者喜宴〉摘译》(一),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》1980年第4期;张怡荪主编《汉藏大辞典》,民族出版社,1985年,第292页。

最终完成了对苏毗的统一。

一、吐蕃统一苏毗与军政建制

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，苏毗被吐蕃征服之前是青藏高原上众多的小邦之一。《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》(P. T. 1286) 内记“在各个小邦境内，遍布一个个堡垒，任小邦之王与小邦家臣者，其历史如下：……苏毗 (sum yul) 之雅松之地，以末计芒茹帝 (vbal lje mang ru ti) 为王，其家臣为‘朗’ (rlang) 与‘康’ (kam) 二氏。”^①

据《贤者喜宴》记载，苏毗可能是在赞普仲年代如时被吐蕃征服的。^②之后，到松赞干布登基之初，羊同与苏毗旧部趁机发动叛乱，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“赞普传记”说“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，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，外戚如象雄、犏牛苏毗……等公开叛变。”但这次苏毗的叛乱并没有成功，先是羊同乘机占领了苏毗旧地，不久松赞干布在苏毗领地杀死了羊同国王李木嘉，苏毗很快被吐蕃收复。正如“赞普传记”所说“娘·芒布杰尚囊对苏毗一切部落不用发兵征讨，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，以舌剑唇枪服之。不损失户数，悉归真正之编氓矣。”后来，通过噶尔·钦陵之口又道出了苏毗这次因为叛乱而被镇压的事件，其曰“吐蕃之神圣赞普，与苍天二者共同笼罩之下，大无过于末·计芒，他深藏于九层地表之下，擒而杀之。”^③

《新唐书·苏毗传》说“苏毗，本西羌族，为吐蕃所并，号孙波，在诸部最大。东与多弥接，西距鹘莽碛，户三万。”反映的就是苏毗刚被吐蕃征服时的国情与地理位置，大致是在今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以西，跨唐古拉山之地，西至今青海索曲北源上游，北达吐谷浑以黄河相邻的地理范围内。^④

吐蕃历代赞普对归附的原苏毗贵族亦予以重用，如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“大事纪年”所载，活动于8世纪中叶的“末·东则布”就是出身于苏毗的王族成员，官至吐蕃大相；^⑤写于公元815年的《噶琼多吉英寺崇佛誓约》记载，参与“崇佛誓约”的有“末氏·论没庐玛” (vbal blon vbro ma)；公元823年立于逻些（今拉萨）的《唐蕃会盟碑》所载的吐蕃高官中有“岸奔木盍苏户属劫罗末论矩立藏名摩” (mngan pon khab so vo chog gi bla vbal blon klu bzang myes rma)，^⑥此人显然也出于苏毗。

自被吐蕃征服以后，苏毗成了吐蕃军政建制中的一部分，称“孙波茹”，其中包括被吐蕃征

①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民族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41~142、173页。

② 有关吐蕃征服的九曲流域的“森波杰”是否就是苏毗，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：杨正刚持肯定的态度，而巴桑旺堆、林冠群则认为两者根本就是地域不同、名称不同的被吐蕃征服的两个小邦。对此争论，笔者倾向于后者的意见。见巴桑旺堆《有关吐蕃史研究中几个“定论”的质疑》，《西藏研究》1983年第4期；林冠群《苏毗与森波杰考辨》，《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》，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91~317页。

③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第128、140、159、172页。

④ 杨正刚《苏毗初探（一）》，《中国藏学》1989年第3期；周伟洲《苏毗与女国》，《大陆杂志》第92卷4期（1996年），收于同作者《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》，中国藏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页。

⑤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第108~109、154~155页“末·东则布” (vbal ldong tsab) 在“赞普传记”中拼作“末·杰桑东则布” (vbal skye zang ldong tshab)。

⑥ 巴卧·祖拉陈瓦《贤者喜宴》，第412页；黄颢《〈贤者喜宴〉摘译》（十二），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》1983年第4期；王尧编著《吐蕃金石录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19页。

服的汉人，共编成11个东岱，分布范围大致为唐古拉山南北的广大草原。^①《贤者喜宴》记其范围是“东至聂域朋纳（guye yol bum nag），南至弥地曲纳（Smri ti chu nag），西至叶晓丁波切（yel zhabs sding po che），北至纳雪斯柴（nags shod gzi vphrd），以仓甲雪达巴园（chang rgya shod stag pa tsal）为中心。”^②此四至的地望，据日本学者佐藤长研究，孙波茹的中心“仓甲雪达巴园”在今边坝以西的丹达塘，东至的“聂域朋纳”在今昂曲（噶木楚河）中下游，西界的“叶晓丁波切”在今札嘉藏布间北侧之叶尔诺札湖，北至的“纳雪斯柴”在今唐古拉山以北尕尕曲南雁石坪一带，南界之“弥地曲纳”在今黑河嘉黎县境麦地藏布。^③可见，藏文文献关于“孙波茹”的分布与《新唐书·苏毗传》所记之苏毗疆界大致是吻合的。

除了将苏毗部落编入“茹一东岱”制度之外，吐蕃还按照自身的位阶制度授予苏毗各级官吏以不同的告身，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“大事纪年”108条记载“及至猪年（肃宗乾元二年，己亥，公元759年——引者）夏，赞普牙帐驻于堆之阔地，多思麻之夏季会盟由论绮力思扎、论多热二人于伍茹之‘列尔’召集之。孙波茹（sum ru）大部授予告身诏令。”^④另据《贤者喜宴》记载，吐蕃还把苏毗小邦王称为“苏毗铁王”（sum pa leags rgyal），把泥婆罗王称为“铜王”等，“这些即所谓四方面王，他们收集赋税上献，因此，他们亦隶属于属民之中。”^⑤这些内容反映出吐蕃与被征服的各小邦在经济上的联系。

在职官制度上，吐蕃对苏毗采取直接派官进行控制的办法，苏毗王族成员可以任到吐蕃大论之职。如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“大事纪年”103条记载“及至猪年（玄宗天宝六年，丁亥，公元747年——引者）夏，赞普驻于那玛，廓州（gog yul）一带出现唐人斥埃军兵。……冬季大会，于‘碴之寨卓’由大论穷桑、末·东则布（vbal ldong tsab）、论莽布支、尚没陵赞等人召集议盟，牧场大料集之尾数扫清。”“末·东则布”就是出身于苏毗的王族成员。^⑥

相应的，苏毗要对吐蕃王室承担聚集粮草兵马、贡赋纳税的任务，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“大事纪年”692年条提到：吐蕃王室征收“苏毗”（sum pa）是年之“关卡税”，702年条提到是年征“孙波茹”（sum ru）之“大料集”。^⑦《册府元龟·外臣部》“降附”条记，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正月，苏毗王没陵赞及其子悉诺逻率众归唐，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云“苏毗一番，最近河北，吐泽（浑）部落，数倍居人。盖是吐蕃举国强授，军粮兵马，半出其中。”哥舒翰是这次苏毗王奔唐事件的主要经历者，上述内容应是据苏毗人所告而转奏朝廷的，基本符合事实。

① 《贤者喜宴》记载“孙波茹”包括通颊在内的11个千户的名称是：七屯（rtse mthon）千户，博屯（pho mthon）千户，上、下郭仓（rgod tshang）千户，上、下炯（vjong）千户，上、下支（dre）千户，喀若（kha ro）千户，卡桑（kha zangs）千户，那雪（nag shod）小千户。见巴卧·祖拉陈瓦《贤者喜宴》，第187页；部落的译名参见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第270~272页。

② 巴卧·祖拉陈瓦《贤者喜宴》，第186页；黄灏《〈贤者喜宴〉摘译》（二），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》1981年第1期。

③ 见佐藤长：《チベット历史地理研究》，岩波书店，1978年，第354~355页；杨正刚《苏毗初探（一）》《中国藏学》1989年第3期。

④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第110、155页。

⑤ 巴卧·祖拉陈瓦《贤者喜宴》，第188页；黄灏《〈贤者喜宴〉摘译》（二），《西藏民族学院学报》1981年第1期。

⑥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第108~109、154~155页。

⑦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第98、148页；第99、149页。

看来，苏毗确实是吐蕃对外拓展的重要“军粮兵马”供给地。

二、苏毗王子悉诺逻奔唐事件

天宝十四载，发生了苏毗王没陵赞及其子悉诺逻叛蕃归唐的事件。关于此事件，《新唐书·苏毗传》记载“天宝中，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，为吐蕃所杀，子悉诺逻率首领奔陇右，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，玄宗厚礼之。”《册府元龟·将帅部》亦言“天宝十三载（754年），吐谷浑苏毗王款塞。”《册府元龟校记》“大事年表”记载，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正月，“吐蕃苏毗王子悉诺逻率首领数十人来降”。

对于此次事件，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“大事纪年”755年条是这样记载的“以兵力捕杀谋杀父王之元凶……迁出末氏、朗氏之奴婢，令二人偿命。”756年条言“清查末氏、朗氏财产之尾数。”^①吐蕃碑铭《达札路恭盟誓之诏书》也记载了这次事件的一些梗概“弃隶缩赞赞普之时，恩兰·达札路恭忠诚业绩卓著，时，末·东则布（vbal ldong tsab）、朗迈色正任大相，忽生叛逆之心，由是，父王弃隶缩赞被害，宾天王子赤松德赞政躬亦濒危境，蕃域黔首庶政大乱。斯时，路恭乃将末·东则布与朗·迈色叛逆事实启奏王子赞普赤松德赞圣聪。末氏、朗氏叛乱劣迹确乎属实，遂将彼等治罪。”^②

据此可知，754年至755年春夏之际，以苏毗王室后裔的末氏和朗氏为首弑杀了弃隶缩赞赞普，率众归唐。由于事情败露，除了没陵赞之子悉诺逻等数十人得以逃脱外，苏毗两千余人均被吐蕃王室捕杀。^③对照以上汉、藏文献的记载，有学者提出藏文文献中的“末·东则布”就是汉籍中的“没陵赞”。^④而笔者倾向于认为“末·东则布”与“没陵赞”并非同一个人，后者可能是驻防于青海的另一苏毗王族成员，当身处逐些的“末·东则布”因谋反被杀后，驻防于外的“没陵赞”方有机会欲率众归唐。此“没陵赞”与前面提到的天宝六年（747年）曾与“末·东则布”一起召集议盟的“尚没陵赞”同名，他们有可能才是同一个人。

此外，汉文史料尚载有一些有关这次苏毗王子附唐的细节。《新唐书·吐蕃传》中言“哥舒翰破洪济、大莫门诸城，收九曲故地，列郡县，实天宝十二载。于是置神策军于临洮西、洮河郡于积石西及宛秀军以实河曲。后二年，苏毗王子悉诺逻来降，封怀义王，赐李氏。苏毗，强部也。”哥舒翰《奏苏毗王子悉诺逻降附状》载记“苏毗一蕃，最近河北，吐泽（浑）部落，数倍居人。盖是吐蕃举国强授，军粮兵马，半出其中，自没陵赞送款事彰，家族遇害，二千余人，悉其种落，皆为猜阻。今此王子，又复归降，临行事泄，还遭掩袭，一千余人，悉被诛夷，犹独与左右苦战获免。且吐蕃、苏毗，互相屠戮，心腹自溃，灭亡可期，但其王逆归仁，则是国家盛事。伏望宣付史馆，旌其慕化。”《新唐书·王忠嗣传》记载“王忠嗣，高丽人，入居营州。父为朔方军将。思礼习战斗，从王忠嗣至河西，与哥舒翰同籍麾下。翰为陇右节度使，思礼与中

①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》，第116、173页。

② 王尧编著《吐蕃金石录》，第84页。

③ 从《册府元龟》卷九七七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所奏“自没陵赞[赞]送事彰，家族遇害二千余人”得知，以末·东则布家族为首参与这次事件的两千余苏毗人被杀。

④ 宗喀·杨正刚布《苏毗与吐蕃及其他邻近政权的关系》，《西藏研究》1992年第3期。

郎将周倬事翰，以功授右卫将军、关西兵马使。……天宝十三载，吐谷浑苏毗王款附，诏翰至磨环川迎接。”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六十“陕西九临洮府”曰“磨环川在卫西。唐天宝十三载，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破吐蕃于临洮西关磨环川，于其地置神策军。宋祁云：军置于洮州西磨环川也。《会要》云：时置洮阳郡于此。又于郡内置神策军，去临洮郡二百里。至德中，沦于吐蕃。”今人唐耕耦著《唐代交通图考》，考辨诸种史籍认为：天宝十二载（753年），哥舒翰收吐蕃黄河九曲，明年分其地东南境置洮阳郡及神策军于磨环川。郡在洮水之北，军在洮水之南，约今西仓、新寺地区，东经102°30′，此岷洮道西通洮阳神策军，又西至黄河九曲吐蕃大莫门城，是亦西通吐蕃之一道。^①苏毗王子款附唐朝，选择东至磨环川与哥舒翰会合，应该说当时苏毗族人就在青海省境内的黄河以南地区活动，这与前述河（黄河）北吐谷浑、河南即苏毗的分析相吻合。

天宝十四载归唐后的苏毗王子此后再无音讯。而《顿悟大乘正理决》记载，有“僧苏毗王嗣子须伽提”与汉僧大禅师摩诃衍在逻些相见，法国学者戴密微推测此人就是归唐的苏毗王子悉诺逻。但笔者不敢苟同，因为“僧苏毗王嗣子须伽提”是公元8世纪下半叶的792年前后在逻些与摩诃衍相见的，很难想象归唐的苏毗王子后来又重返吐蕃，或像戴密微推测的那样在吐蕃攻陷陇右时重新被俘，因此，这种出现的时间、地点以致背景都不相同的两个苏毗王子不大可能是同一个人。^②

三、中晚唐敦煌、西域的苏毗人

“安史之乱”爆发后，吐蕃先后占据了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广大地区，于是征调包括苏毗在内各个茹的部落，分别驻守于今青海北部、河西走廊及天山以南等地，时间长约百年之久。这样，有一批苏毗人分别迁驻于上述地区，这从敦煌发现的藏文卷子及新疆出土的吐蕃简牍中得到了证实。P. T. 1080《比丘尼为养女事诉状》言“往昔，兔年于蕃苏（bod sum）部落与吐谷浑（va zha）部落附近，多人饥寒交迫，行将待毙……”；P. T. 1083《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》言“亥年春，大论于陇州军帐会议上用印颁发之告牒：兹据唐人二部落使秉称‘此前，沙州汉户女子每为蕃苏（bod sum）部落及个别尚论以婚配为名，抄掠而去，（实则）多沦为奴婢。凡已属赞普之子民均已向上峰呈报，不得随意抄掠。应如通颊之子女，不予别部婚配，而允于部落内部婚配。’”^③以上文书提到“蕃苏部落”、“沙州汉户女子每为蕃苏部落”抄掠等，反映出吐蕃统治时期苏毗人的部落曾经入住敦煌，因其已经高度“吐蕃化”而被称为“蕃苏”部落，说明他们当时处于统治者的地位。^④

前面说过，苏毗的王族姓“末氏”（vbal），而我们在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献中，就发现了有苏毗“末氏”（vbal）在吐蕃统治下的敦煌任职的情况。P. T. 1089号文书，被法国的拉露女士称

① 唐耕耦《唐代交通图考》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，1985年，第549~550页。

② 戴密微著；耿升译《吐蕃僧诤记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1984年版，第27~29页；张广达《唐代禅宗传入吐蕃与有关的敦煌文书》，《西域史地丛稿初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，第199~200页。

③ 王尧，陈践译注《敦煌吐蕃文献选》，四川民族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48、51~52页。

④ 有学者认为：bod sum应译作“蕃苏”部落，意为“蕃化了的苏毗人”，其地位及任职序列均在后为吐蕃征服的吐谷浑人之上，基本与吐蕃人平等，见杨正刚《苏毗初探（一）》，《中国藏学》1989年第3期。

作《公元8世纪大蕃官吏诉请状》，它于公元9世纪20年代在敦煌被编成，其中提到有苏毗人“末·塔玛腊”（vbal dra ma legs）任沙州“小节儿”（rtse rje chungu）兼“州内守备长”（dgra blon go cu rub），^①这一记载与前引P. T. 1080《比丘尼为养女事诉状》、P. T. 1083《禁止抄掠汉户沙州女子牒》提到沙州及其附近驻有“蕃苏”部落的情况可以互相印证，说明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确实驻有出自苏毗的部落。

P. T. 1089号文书中的一段文字，还记载了吐蕃凉州节度衙（mkhar tsan khrom，其中的khrom又译“节度使”）的情况，这个节度衙下属的几个千户中，就有吐蕃化的苏毗千户。约在公元9世纪20年代，这个节度衙内因官位之争，发生了各族官吏间的纠纷，对此，吐蕃当局曾进行过一些调整，经过调整后的各族千户官吏序列如下：“蕃苏之千户长，通颊与吐谷浑之千户长。……蕃苏之小千户长，……通颊与吐谷浑之小千户长。”^②可见在吐蕃凉州节度衙内，吐蕃化的苏毗人的地位较高，通颊、吐谷浑次之，它反映出苏毗人在整个吐蕃统治体系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事实。这些藏文文书反映了苏毗部落被征调至河陇地区长期驻守，以后就留居于该地区的情况。

又，在今新疆米兰吐蕃古戍堡遗址和田河上的麻扎塔格等地出土了一批8~9世纪的古藏文文书，在这些文书中记载了一些驻防该地的苏毗属下的部落，如上、下郭仓、七屯、那雪等。譬如有简牍记载“把箭、弓、箭袋、刀、盾交与‘下郭仓’（rgod tshang）部落之纲木鲁贝……”；“下郭仓部落，箭、弓……腰带、盔甲、铠甲（交来）”；“七屯（rtse vthon）部落的托古芒杰从朗赤勒处借得小麦和大麦各半克。偿还的时间定于蛇年仲秋月之二十日，地点为大罗布”；“……上部等地之田一突，其中半突由悉诺穷耕种，那雪（nag shod）部落……两突地，内有茹本农田一突和零星地一突。为军帐长官耕种。”^③

出自麻扎塔格的古藏文《斥候名单残卷》第2行提到了两个吐蕃人（bod nyis）和两个于阗人（li nyis）被安置在通颊（mthong rtse），第4、5行提到了一个出自苏毗（sum pa）族的巡吏（tshugs pon），此人名叫牙莫孙（gya mog seng）。^④同出于此地的另一件古藏文写卷《某庄园呈塔桑阁下书》，正面是来自六个庄园面呈塔桑阁下的请愿书，主要内容涉及从羌若（skyang ro）送来三袋又十一捆什物以及这个传令兵的身份，还提到了一个被称为“纳”（nag）的地方，一个属于“吐火罗”（phod kar）的标记，四个士兵的粮食标准等；背面为一件不同内容的文书，提到了于阗僧（vu ten bande）洛桑勒的一位男性亲属，叫苏毗萨勒（sum pa gsas slebs），被送往尚论处接受审查。另一件古藏文写本也记有苏毗的人名，此人叫做“苏毗人班卓”（sum pa pang kro）。^⑤

① 山口瑞凤《沙州汉人による吐蕃二军团の成立とmkhar tsan军团の位置》，《东京大学文学部文化交流施設研究纪要》第4号（1980年），第25~27页。

② M. Lalou, *Revendications des Fonctionnaires du Grand Tibet au VIIIe Siècle*, Journal Asiatique, CCXLIII, 1955, 1~4 (2), p. 177.

③ 王尧, 陈践编著《吐蕃简牍综录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30、47、55页。T. Takeuchi, *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*, p. 189.

④ T. Takeuchi, *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*, p. 15, no. 47.

⑤ F. W. Thomas, *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*, part II: Documents, London, 1951, p. 241; T. Takeuchi, *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*, p. 51, no. 153; p. 68, no. 207.

值得一提的是,吐蕃对河陇的统治结束之后,苏毗仍然活动于从新疆南部到河西走廊一带。据著名的《钢和泰藏卷》记载,公元925年于阗王李圣天派使团前往沙州,其中的首领便是出自苏毗的“末·颊心”(vbal rgyal sum),此人仍然被冠以“大论”的头衔。该文书的古藏文呈请书(草稿1~23行)说“于阗国之臣(yvu then gyi vbangs)末·颊心(vbal rgyal sum)与我等全体使臣谨察请于太保王驾前:若不向人间之王大保呈请,就别无他处可求。我等微末贱臣去年被派作使臣由于阗分两次前来。末·颊心、守夏里(su sha li)、夏都(sha vdu)主仆四人从于阗启程先行。(途中发现敌人足迹,改从新路)上司拨给骆驼两峰于途中死去,(我等)仅能活命来到人主太保之前。此后韩新佳(ham cin ca)、毕都督(vbye tu tu)、赵都督(co tu tu)向我主狮子王呈请,一到沙州,即向君主(太保)禀报,恳请再次派后备(使者)从狮子王……,此次去后未获成功,只能另想他法。”^①

《钢和泰藏卷》的于阗文呈请书第二段(7~24行)所记内容可与古藏文呈请书互补“狮子王尉迟娑缚婆(viśa'sambhata)十四年,鸡年,十月十二日。这个呈请书是由在沙州的使臣们:论·颊心(bulunā rrgyaḍā sūmā)与唐古特(ttāgutta)地方的太守Ṣarmādattā,于阗Hvaṃna地方的太守Ṣaṃdū,和Naṃpa jamñai地方的太守Ṣvāṃnakai共同起草的,所有这些人都了解这些城镇。”^②以上使团为首者的于阗文拼法bulunā rrgyaḍā sūmā(“论·颊心”),在该呈请书的第35行又写作baḍā rrgyaḍā sūmā,后者相当于古藏文的vbal rgyal sum(“末·颊心”),他显然是一个出自苏毗王族的人。以前托马斯等错误地认为vbal相当于古藏文中的bal(泥婆罗),故认为此人似为原住泥婆罗之吐蕃人,后又在于阗供职,为李圣天所信任,六次出使沙州,第七次仍由他率领第一批先行启程。^③对此,贝利已经指出宁愿将vbal看成是一个吐蕃人的姓氏。^④尽管贝利没有指出“末”(vbal)氏源出苏毗,但如上所述,唐末五代的苏毗已经高度“吐蕃化”,将其称为吐蕃人已能接受。通过对以上《钢和泰藏卷》记载情况的讨论,使我们确知9世纪中叶吐蕃对河陇的统治结束之后,苏毗人还继续在于阗活动,而且其势力与影响尚存,这与该族长期在西域活动的历史不无关系。

(作者单位: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)

责任编辑:陈霞

责任校对:王文洲

① F. W. Thomas, & S. Konow, *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 - huang*,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, 3. 3, 1929, pp. 122 - 130; 黄盛璋:《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》,《新疆社会科学》1984年第2期。

② H. W. Bailey, *The Staël - Holstein Miscellany*, Asia Major, 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, New Series vol. II part I, 1951, pp. 2、8、44.

③ F. W. Thomas, & S. Konow. *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 - huang*, Oslo Ethnografiske Museums Skrifter, 3. 3, 1929, pp. 122 - 130; 黄盛璋:《钢和泰藏卷与西北史地研究》,《新疆社会科学》1984年第2期。

④ H. W. Bailey, *The Staël - Holstein Miscellany*, Asia Major, A British Journal of Far Eastern Studies, New Series vol. II part I, 1951, pp. 3、8、23、44.